

郑伯奇

沙上足迹

文坛漫忆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春兰

封面设计:陶雪华

文坛漫忆丛书

主编 陈青生

沙上足迹

Shashang Zuji

郑伯奇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 10/16 · 插页 4

字数:230 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 000 册

ISBN 7 - 207 - 04362 - 7/I · 651

定价:19.70 元

目 录

主编者的话(陈青生)/1

第一辑

忆创造社/3

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34

略谈创造社的文学活动/58

创造社三题/67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73

回忆艺术剧社/105

艺术剧社前后/113

“左联”回忆片断/119

“左联”回忆散记/125

附录: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及其他/142

第二辑

悼《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先生/151

鲁迅灵前答客问/154

不灭的印象/157

- 鲁迅先生的演讲/164
最后的会面/167
回忆和学习/171
二十年代的一面/175
——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
回忆瞿秋白烈士/194
怀念郁达夫/199
悼聂耳先生/205
消夏回忆/207

第三辑

- 沙上足迹/213
——文坛生活二十五年
我的文学经历/217
即兴主义的与即物主义的/225
——我的创作态度的一省察
我最近对于文学的感想/231
由“七七”到“八一三”/233
——抗战初期上海文艺界动态的一段回忆
由上海西站到镇江西站/235
关于西安的文艺活动/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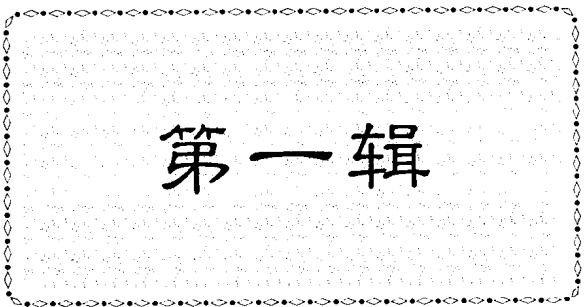
第四辑

- 致曾慕韩信/243
致恽代英信/248

- 致工独清信/253
一九二一年日记/256
《鲁森堡之一夜》代序/265
《两栖集》后记/275
《参差集》后记/277
华汉作《地泉》序/279
尤兢作《浮尸》序/281
《每月文库》总序/283
《每月文库》二辑弁言/285
《每周文艺》发刊的话/288

第五辑

- 回忆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学生运动/293
辛亥之秋/297
学生队/316
——“辛亥之秋”续篇
编后记(郑延顺)/330



第一辑

忆创造社

关于创造社，郭沫若同志的《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编》是最直接而又最可靠的史料。他不仅忠实地叙述了创造社的历史事实，而且他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创造社的活动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总结。但是他的叙述只到一九二六年去广州参加北伐为止。像他所说的：“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后，后期创造社的那一部分。”他认为“让仿吾、初梨、乃超来写，更要适当一点。”这是很有理由的。当创造社转变之初，他被反动派追迫，不得不离开祖国；以后创造社的许多活动他没有亲自领导和参与。仿吾、初梨、乃超都是当时活动的中心人物，又都先后参加了党。创造社转变以后就接受了党的领导，从党的角度来看后期创造社的活动，认识、评价都会更加全面、正确。但是他们一直忙于其他重要工作，谁也没有把这一段严重的斗争写下来。而托派分子王独清，在创造社非法被封以后，趁机大做文章，幸灾乐祸，歪曲事实，挑拨离间，自我吹嘘，妄想破坏革命文艺战线的团结，增加反动政治资本。在反动统治时期，由于政治环境，不便公开揭发，致使谬说流传，真相蒙蔽，实可愤慨。事实上，后期创造社的许多纠纷，都是王独清在作祟。如今，太阳已经照耀天空，王独清的鬼蜮伎俩必须揭穿，大是大非必须明辩。因为创造社的内部斗争也是我国革命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

部分。王独清是我引进创造社的，他的情况我知道也较多，自觉责无旁贷。因此，去年《文艺月报》要我写回忆创造社的文章，我就答应了。

我虽是创造社较早的成员之一，但前期的活动参加的很少。后期的活动虽然参加了，可是我不能从更高的角度去看问题。因此，关于创造社，只能结合着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谈，可能不全面也不深刻。就是这样，当一开手写起来，仍然遇到不少困难。譬如缺乏资料，以前的日记、信札、连同书籍杂志一道，内迁的时候，留在上海，迄今毫无着落。其次，可以交谈当时情况的老友多在远方，见面不容易，通信也难详尽。而记忆力又渐衰退，回忆也有困难。所以时写时辍，久未完成，给《文艺月报》造成不少麻烦，深感抱歉。今当盛大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三十年前被敌人扼杀的创造社，更引起了我们的忆念。这篇文章，错误、遗漏，在所难免，以作纪念，实不相称。有沫若同志的著作在前，殊难免“狗尾续貂”之诮；但对仿吾、初梨、乃超、彭康诸同志，期其能起“抛砖引玉”之用。我切望有关诸同志写出更正确更全面的纪念文章来。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所掀起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团体一般都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其中这种倾向表现的最鲜明、最尖锐、最强烈的要推创造社。

创造社的诞生，不用说也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但它和五四运动的这个主导团体却没有直接关系。它和当时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还曾发生过一段小小的误会，一时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至于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新月派”就把创造社看作眼中钉，不断地加以造谣、侮蔑、分化、打击，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力量。因此，在

较长时期,创造社处于孤军奋斗的形势之中。这种形势的造成不能看作人和人的关系,而是有比较错综复杂的原因。

创造社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酝酿、发起、成立起来的。创造社成员的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倾向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讲,留日学生既不像留美学生那样多属于达官富商的子弟,也不像留法的勤工俭学生那样经过劳动锻炼,绝大多数是没落地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到日本留学无非利用少化钱少跑路等便利条件来求得些新知识为祖国效劳,可是冷酷的现实却给他们很大的刺激和教训。自从甲午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直接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露骨的侵略行为不断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中国留日学生每次都站在这些反抗运动的前列。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从来是最敏锐最强烈的。同时,日本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也在日本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开展起来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受到国内五四运动的触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绪很快地高涨起来。创造社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所以表现得特别鲜明、尖锐、强烈,和上述的这种环境大有关系。这和以胡适、徐志摩等留美学生为首的新月派对比起来,就更加明显。在创作方法上,创造社也和文学研究会所揭橥的主张大不相同。一般人都称创造社为浪漫派。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大都提倡浪漫主义或者追求自然主义以后的新流派,如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这是受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当时日本文学界的新思潮也起了一定作用。十九世纪末叶,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文学就走上了反现实主义的道路,连自然主义也吃不开了,象征主义、唯美主

义、新浪漫主义等新流派像雨后春笋一般簇生出来。日本由于大战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急骤地伍于帝国主义行列，日本文学界也得到相应的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突然衰颓下去，西欧所发生的各种新流派代之而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学习环境的影响，所以，惠特曼、王尔德、有岛武郎等人的名字曾经屡屡出现在创造社作家的笔下。由此可见，并不是创造社硬要标新立异，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子，故意和国内其他文学团体闹对立，而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应该承认，无论怎样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仍然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正需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来反映，来表现。创造社的刊物和作品受到当时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这就说明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所以产生了浪漫主义是有一定的现实要求和时代背景的。

二

我参加创造社是由于郭沫若同志的引进，而我和沫若的结交乃是由于田汉同志的介绍。那时候，我和田汉同志都曾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这是五四时期比较广泛的青年团体，我们都因为同学的介绍而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国内各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在日本的会员很少。我们两个素不相识，又分处两地：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幸亏当时有一种风气，素不相识的青年，只要是属于一个团体或者有人介绍，便可以互相通信往来，成为亲密的朋友。我们既属同一团体，又有共同朋友，也就这样通起信来了。假期的时候，我到东京去看这位未见面的朋友。田汉同志非常热情地招待我，真像久别重逢的故人一样。他招待我去看当时刚刚上演的梅特林克的新剧《青鸟》，使我第一次接触到

欧洲最新的象征主义艺术。这是东京的一群文艺家组织的爱美剧团演出的，扮演姐姐和弟弟的中条八重子和夏川静江，那时候还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大红大紫的名演员。前些时候，看见夏川静江在日本影片《混血儿》中扮演院长的那副温厚的中年妇人的形象，不免使人回想起当年她演《青鸟》中小弟弟的情景。在田汉同志的引导下，我还亲身欣赏了《咖啡店之夜》的真实场面。他给我介绍了李初梨兄弟和东京一些其他爱好文学的朋友。通过他，我还认识了日本当时进步学生团体“新人会”的几个人物。但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介绍我认识的郭沫若同志。

一九二〇年三月间，就在《三叶集》出版前后，寿昌——这是田汉同志的大号，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到京都来了。在先他曾写信告诉我，游览京都以后，他要去福冈访问“沫若兄”的。我那时已很熟悉“沫若”这个名字。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那首《死的诱惑》，并且是通过日文翻译的。因为当时日本报纸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以他的那首短诗为例，译成日文发表了。我觉得那首诗的情调、意境比当时许多诗人的名作要高超得多。以后我在国内的报刊上经常以敬佩的心情读到他的作品。但对于他的身世，却一无所知。寿昌和他经常通信，讨论文艺问题，这些书札已经编入《三叶集》了。虽然他们两人也还没见过面，可是书信往来，已经成为老朋友了。寿昌非常热情地要给我介绍他的这位未见面的老朋友。他说，他的学名叫郭开贞，就在九州大学医科读书。啊，原来还是“大高同学”（日本学制，高等学校毕业升入帝国大学，在这一系统的不管是否同校学习，统称大高同学），而且这个学名，我到日本不久，就听人说过，说他是怎样聪明好学，这样一来，就觉得好像很容易接近了。我非常希望通过寿昌的介绍能够认识他。

寿昌到京都以后，我们一道游览了岚山和琵琶湖等名胜古迹，他很感兴趣。在他的提议下，我们还访问了厨川白村。当时厨川正

以崭新的文学评论家的姿态，批判自然主义文学，介绍西欧的新文学流派，在日本文坛上享有盛名。他的著作，像《现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等书都先后译成中文，国内也很流行。我那时刚在高等学校一年级读书，去见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自觉不太合适。结果，由田汉出名写信约定时间，我是作为东道陪同去见的。在一个春夜，在教授的寂静的客室里，田汉提出了不少文艺上的问题，宾主似乎还有异论，但详细情况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了。从此，我和厨川总算认识了，以后，我为给《少年世界》写一篇有关日本妇女运动的稿子，还访问过他和他的夫人。后来，沫若来京都时，我曾想约他去看厨川，他没有同意。日本大地震那年，这位跛脚博士去海滨避暑，被大浪卷入海中，成了震灾的牺牲品。

我送寿昌从车站回来，看见一群青年在公园打棒球，球的撞击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一种清新的力的感觉，激动着我，我便饥不择食似地，写了一篇分行而稍带韵脚的东西，寄给在福冈的寿昌，请他和沫若同志指教。寿昌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附有沫若鼓励我的短札。我和沫若就这样通起信来了。

寿昌的福冈之行，给我带来了和沫若相识的机会，间接地使我由此得以参加创造社，进而加入文艺运动的行列。回忆起来，寿昌的深厚友情，我是深深感谢的。

三

我认识沫若，正是他的创作活动日益旺盛的时期。他经常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和散文，有时也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我们通信以后，他常在信里寄来他的新作，让我先睹为快。他很虚心地征求读后的意见，可是我当时对文学艺术缺乏深刻理解，像样的意见提不出来。倒是我自己写的一些不高明的东西向他请教，他总是恳切地加以修改、指正，使我获益不少。有些东

西，还是在他鼓励之下发表出去的。

沫若当时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他曾几次决心要休学或者转学，但考虑到家累和职业等问题，又下不了决心。他曾来信商量想转到京大来改学文科，我覆信表示衷心欢迎。日本的文科只搞研究不管创作，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觉得，京都的环境幽静，文科的学习空气比较自由，对于搞创作也许会有好处。他经过考虑以后，还是决定不来。他的决定是对的。当时的京都是太沉寂了，对于他那样富于革命激情的人是不合适的。

沫若当时的创作活动也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譬如发表问题，沫若似乎不感到什么困难。宗白华同志编辑的《学灯》给他提供了美好的园地，不断地刺激他的创作活动，使他写出了不少的优秀诗篇。但是《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而《时事新报》则是研究系的机关刊物。五四时代的青年对于这样有关政治的问题一般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宗白华同志赴德留学，《学灯》编辑易人，沫若的投稿就逐渐地少了。

跟发表作品有关的还有作家的风格、流派和相互关系问题。

沫若开始创作，接受欧洲文学艺术思想，在《新青年》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前。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别是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政治影响，鼓舞、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鼓舞、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在狂风暴雨式的诗篇中，倾泻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激情，因而激发起国内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受到他们的热爱和拥护。但是他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风格在当时文学界内是相当孤立的。本来文学界内，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其中志趣相同，风格相近的人结合起来，搞一块共同的园地，发挥自己的主张，发表自己的作品，这种结合，在旧社会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趋势。这样，就会在文学史上形成一种流派，甚至形成一种运动，对于文学

发展上往往发生一定促进的作用。沫若在他的创作发展的道路上，随着自己的风格的形成，对于战友的响应和支持，日益感到需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况且，当时文学界的情况比较复杂，反动派的复古文学伺隙而动，胡适之流的买办文学还很猖狂，这就更需要集合志趣相同的人来共同奋斗。恰好，当时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特别是在沫若的先后同学中，就有一些人已经从事创作，由于学习条件和文学修养的关系，他们的文学见解和沫若比较接近，这就给结成一个文学团体创造了有利条件。“创造社”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酝酿、成立起来的。

“创造社”最初的成员，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都是沫若当时在“大高”的同期同学，也就是他在“一高预科”的同班（当时日本有高等学校八所分设全国各地区，第一高等学校设在东京，特别给中国留学生成立预科，每年招收一班新生，一年结业后，分发各高等学校，毕业后再升大学）。仿吾同志虽比他早一期，但他们两人却是“六高”（第六高等学校的简称，在冈山）的同学，相处的时间较长，相知也较深。达夫在“一高预科”的时候，已经显示了出色的文学才能，分到“八高”（第八高等学校的简称，在名古屋市）以后，他经常写些旧体诗文，在这方面，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仿吾的外国语文造诣颇深，他曾参加过英文字典的翻译工作，在学校读英文书，差不多可以不翻字典，并且因为熟悉英文，他学德文又快又好。沫若的文学修养和外语程度更不须多讲了。他们几位，年纪相若，时代相同，学习环境又一样，文学修养和文艺思想比较接近，他们要在文学战线上结合起来，共同奋斗，那真是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但是，创造社并不是一下子就搞起来的，而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酝酿。沫若的创作活动和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无疑曾给当时留日

学生，特别是他最接近的同学中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仿吾的诗和达夫的短篇小说接着也在《学灯》上先后刊出了。大家一方面在热情地创作，一方面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想发表意见。这样，组织团体和开辟发表园地就更感到迫切。但是，当时大家都在国外，又都正在求学时期，要结成团体办刊物，那是非常困难的。记得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曾经把仿吾的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和其他作品，钉成一个小册子传阅，大家在后面空白上写评语或感想，这可以说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同人刊物。不过这样传阅的同人刊物并没有继续办下去。以后，大家曾经讨论过和国内书店合作办刊物的问题。寿昌曾为此事向国内有关方面联系过，但毫无结果。直到仿吾由于他的朋友李凤亭先生的介绍和上海的泰东书局发生关系以后，创造社的组织和出版刊物的问题才逐渐具体化了。

仿吾是读到大学三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坚决退学回国，准备专办刊物的。这当然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在仿吾本人无疑是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才痛下决心的。创造社初期几个主要作家，无论沫若、仿吾或达夫，他们在大学，谁也没学文科。沫若在“九大”（九州帝国大学的简称，设在九州岛上的福冈市）学医，知道的人很多。达夫学的政治经济科，比较跟文学还接近些；仿吾学“造兵科”，就是制造大炮机关枪之类的专业，离文学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他们所学的和以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他们三人的哥哥都曾留学过日本，都和辛亥革命有关系。他们年纪青青，就在自己的兄长的同意和帮助下，去日本留学，入学志愿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当初入学的时候，他们年纪很轻，按照当时社会要求和家庭希望所选报的专业，自己也颇为满意。但是在相当长的学习期间（由“一高预科”到

大学毕业,正规学习需要七年至八年,加上预备时期就更多了),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时代思潮也在不断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使他们对于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和苦闷。等到他们的创作活动日益频繁的时候,这种矛盾和苦闷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继续以前的专业学习简直成为很大的痛苦了。仿吾的情况尤其是这样,他到日本去的时候,年纪很小,是跟他的哥哥成劭吾先生同去的,而他的哥哥又是一位老同盟会员,仿吾选择“造兵科”可能是受了这样环境的影响。但是他在学校期间,由于学习德文而接近了歌德、席勒,又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而热爱托尔斯泰;这些文学方面的精神力量不断冲击他选择“造兵科”的那种思想基础。开始创作活动以后,他的内心的矛盾更加剧烈了。他和沫若有相同的苦闷。他们都愿意半途退学,从事文学事业。恰好仿吾有位同乡李凤亭先生来信叫他担任泰东书局的文学方面的编辑主任,他就毅然决然抛弃学业而归国了。沫若得到仿吾归国的消息,立即下定决心抛掉医学,离开家庭,跟仿吾一道回国,共同战斗。但是他们回到上海以后,情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约请仿吾回来的李凤亭先生已经他去了,泰东书局的计划只是纸上空谈,而所谓文学主任者还另有人在。他们投奔泰东,等于上了一个大当。泰东经理赵南公看见有人投上门来,可以利用,而沫若的声誉更可资号召,便高兴地留下他们。仿吾觉得泰东这样局面容纳不下两个人,他便自动地回长沙去了。

沫若在上海待了一个时期,得到泰东出文学刊物的诺言以后,他又返回日本纠合同人。他回到福冈的家里,匆匆只住了一天,便到京都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二十年代的一面》中,把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说成是在泰东书局经理室,那是完全误记了)。他那广额、巨颅、宽阔的胸围、方整的身材都表示了健康的精神和